

# 女性素质与科教兴国

屠文淑

(宁波大学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女性素质是一个关联人口素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 提高女性素质更为刻不容缓。女性素质的全面加强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更需要女性自身的坚韧努力, 不懈追求。

**关键词:** 女性素质; 科教兴国; 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1)02-0066-05

## The Quality of Women and the Country's Prosperous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TU Wen-shu

(The Law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women is an important issue associ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On the coming of new century, it is a matter of great urgency for China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her female sex and carry out the strategic measures of making the country prosperous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full enhancement of the quality of women needs the concerns of whole society,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e untiring efforts and the unremitting seeking of women themselves.

**Key words:** the quality of women; the country's prosperous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social economy

人口素质, 是一个涉及人口学又关联社会学的复杂问题。人的素质是人的品质、知识、能力、体质和心理特质等要素的综合体。女性因其不同的生理特点, 特别是长期历史沉积的封建意识的强大作用, 在思想观念, 接受教育和个性形成中受到层层禁锢和压抑, 造成群体素质的不平衡和某些缺失, 影响了

女性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意识, 限制了女性从事社会活动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身潜力的充分发挥。提高女性素质已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又是进入新世纪对人的共同要求。

(一)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尽管是文学作品的命题,

收稿日期: 1999-07-12; 修订日期: 2000-01-05

作者简介: 屠文淑(1952-), 女, 浙江宁波人, 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心理学、历史学、妇女问题。

却包含有人口学的道理。组成人类1/2的女性是当代社会一支强大的有生力量，她们不仅从事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还肩负着人类的繁衍，维系和稳定着千百万个社会的细胞——家庭，为社会孕育、培训、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所以说女性既是人类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又是社会的支撑者和推动者。

基于女性对人类社会特有的作用，女性素质可以说是直接关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关系中国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目标的重要课题。女性素质的重要性也存在于它的外延功能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 女性素质关系到家庭中后代的素质。据近十多年澳大利亚亚亨特基因研究所报道的研究成果，人类基因中与智力有关的基因主要集中在X染色体上，母亲体内的遗传因素对子女尤其是儿子智力情况的影响远高于父亲。其提出的科技依据是：女性的染色体是由两条分别来自父母的X染色体组成的，男性染色体则是由一条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和一条来自父亲的Y染色体组成的。如果母亲X染色体上的智力基因与众不同，其女儿尚可有一条来自父亲的X染色体抵消这种变异，而儿子继承父亲的Y染色体则没有这种抵消作用，完全接受母亲的智力基因。在亚亨特基因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公布之前，遗传学关于母亲在生理、心理(包括智力)方面对子女的遗传作用早已作出无可辩驳的科学结论。

女性素质关系到对后代的培育，关系到个体社会化的起点。人接受社会化的第一阶段即基本的社会化普遍是在家庭中完成的，母亲是子女最亲近的人，又自觉不自觉地兼任了传授知识、道德、行为方式的启蒙老师的角色，母亲的文化修养、言行举止在潜移默化中对子女知识构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教化作用十分显著，甚至影响子女社会态度的形成；影响他们作出的各种重大的选择；贯穿他们一生。中国出过一本名人谈母亲的书籍，有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工作者，都深有感触地谈到母亲对自己人生、事业等方面所起到过的无可比拟的作用。

2. 女性素质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因为女性素质与社会经济是彼此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从一个层面看，广大女性同男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推进者，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中国女性就业率高，就业领域十分广泛，职业覆盖面

几乎达100%。据统计，在国民经济12个行业中，女职工达100万人以上的行业占9个，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卫生、教育及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在女性比较集中的企事业部门，女性占部门总人数的80%以上，如教育系统的幼儿园和小学，工业部门的棉纺厂、丝织厂，食品加工和各种类型的服务行业等等。可以说女性管理者和劳动者掌握的科学知识含量和劳动技能直接关系到知识在这些部门的传播和运用，对这些部门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女性管理者和劳动者工作中的创新能力、素质程度对这些部门的盛衰存亡更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女性素质的高低不仅作用于家庭，更关系社会，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关键是知识、信息和高科技的差距，本质是劳动者素质和创新人才的差距。作为劳动者主体部分的女性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掌握运用高科技人才的开发，就等于为社会经济发展开启了巨大的动力资源，完备了社会的动力机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科学技术的重大飞跃，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对女性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女性整体素质却与社会的要求距离比较大，诸多方面亟待提高。相当数量的女性存在科学文化水平低、知识视野窄、自主意识弱、依附思想深、封建遗痕多等多种弱项，从而限制了她们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施展。比如在女性就业问题上就呈现底宽上尖的金字塔状，即大多数女性从事落后低层次的生产劳动，随着职业对知识和技能要求的增高，女性人数趋于减少，进入尖端的高科技研究机构和政府领导部门中的女性，与其总人数相比较，更是凤毛麟角，寥寥可数。女性素质的相对低下，又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变换，劳动形式的转换，形成障碍和牵制，并且会产生一系列不利的连锁反应。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技的突破性进步推出了一个变化万千、目不暇接的新科技时代。女性群体要适应这个发展进化的时代，就必须取得在社会生存和发展上的主动权。适应时代，首先在于更高层次上的参预，就是以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参与社会的改变和进化，参预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运用。只有能够和敢于参预，才能适应科技成果带来的生产环境、生产对象和生产工具的变化，争得实际运作的机会和场地，使智慧、能力得到施展和发挥，从而推动社

会经济更高速发展,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 (二)

提高女性素质既是女性的进取目标,又是全社会扫清封建残余意识的思想更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以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辉煌为荣。但是,漫长的封建专制体制加给女性的是沉重的精神桎梏。中国女性长期遭受社会、家庭的双重压迫和奴役,处于一种依附、仆从的可悲境地。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与新政权的建立是同步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措施保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从政治、法律上保证女性享有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权力。然而“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sup>①</sup>中国女性获得和使用权力的实践完全验证了马克思的这两句话。建国之初,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明显滞后于新形成的生产关系,女性素质受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制约,在被动而突然地获得社会地位和权力后,缺乏对权力的理性认同,不能珍视、维护和把握权力,更不能自觉主动地提高社会才能,以便充分地使用权力。与此同时,旧政权解体后,封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随之烟消云散,依然顽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时时以各种形式作用于各个层次的女性,这对长期受到封建伦理压抑,主体意识尚未完全觉醒的中国女性无疑是一种强大、却又是隐性的阻力。女性自身的不足,封建意识的顽强作用,这两重因素使政治和法律赋予女性的地位和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以及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感是中国女性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才逐渐感受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感受愈益强烈。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近30年的历史中,国家实施的是计划经济,没有竞争,普遍就业,平均分配;行政指定,比例参政。不同素质、不同才智、不同能力的人享受平等的工作权力,获得同等的劳动报酬,个人不同的才智特征被社会平等、平均的运行规则磨化整合。此外,强化政治效应,以成份、出身、家庭的政治属性作为甄别、选拔人才的根本标准,突出女性地位和权力的外在形式,出现了“铁姑娘”、“半边天”象征女性是社会重要力量的特定词语。在个人智慧和能力得不到承认和凸现的社会整体氛围中,在新旧政治制度更替中被砸去镣铐的女性自然

不可能超越时代环境,认识到提高自身素质和竞争意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反而沉浸在外在形式眩目的光环中,持有一种心安理得的轻松感、胜利感。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竞争机制引入了社会运行的各个领域,女性享有的社会地位和各种权利的外在保证,在利益驱动的经济社会中逐渐失落,保留的是法律规定的意义。一方面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唤醒了女性群体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暴露了女性群体在经济社会中的不利因素和被动地位,像国有企业的整改中,从事简单机械生产的下岗工人中,女工人数远远高于男工。同时,封建思想意识的直接载体——性别歧视也从内隐到外显,以各种形式表现在对女性社会地位、社会权力,直至人格的轻视,例如一些公司、企业对应聘女性选拔苛刻,附带条件,甚至拒绝考虑;有的公司、企业公开标明不聘女性;女大学生与同等学历的男生在求职择业方面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境遇。在一些部门培训、提拔员工不以女性为对象,对女性人才多利用,不任用,承担领导和管理角色的女性数目出现减少趋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从千年的封建意识和封建传统伦理基础上拔脚出来的女性群体由于整体素质的相对欠缺,在外在力量保证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发生震动时,一部分女性就会产生无所适从的迷茫和失落,进而失去自身的目标追求,重新回到“相夫教子”传统女性角色模式中,并以此聊以自慰。即使一部分在某个领域有所成就的女性,也会因潜在的、内隐的封建文化心理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特有的激烈竞争中,甘心减速,满足现状,不愿做最后的冲刺和拼搏。更有甚者,在人们的价值取向、人生目标追求从单纯的信仰型转变为多元化、多面性的市场导向机制条件下,一些妇女视听和思维发生迷乱,例如有的女青年不思上进,好逸恶劳、自甘堕落,步上色情陪侍的耻辱之路;有的妇女不惜背弃家庭、不惜出卖人格和尊严以换取金钱和物质享受;有的以色相与党内腐败分子勾结,以“情妇”的身份聚敛钱财、腐蚀社会、败坏风气。凡此种种,尽管不能代表女性整体,但是她们的所作所为却形成一种强效能的负面辐射力,污染、亵渎了女性群体,阻碍了女性素质的提高。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在以供求关系、价格调节和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女性要维护自身地位和权力的奋争内容,与已截然不同,女性必须自己站立挺直,转变思维角度和行为方式,进而带动整个社会逐渐消除封建残余意识,在社会变革中提高自身素质,对民族、对国家有所作为,在有所作为中争得女性应享有的平等权力和地位。

### (三)

提高女性素质,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进行人力资源的开掘。在新世纪之始,科学技术改变了整个世界,知识经济已见端倪。这对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的中国既是发展的机遇,更是严峻的挑战。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sup>①</sup>知识创新、人才开发与科技发展是相互包含,互相渗透的联结体,只有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才能推动科技快速发展,达到振兴国家的目标。要做好知识创新和人才开发,根本是把综合教育搞上去,把我国人口多的劣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也包括女性素质的提高。

提高女性素质既要依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又要吻合时代的特性。现代社会对任何女性个体而言,提高素质离不开三方面的内容:

1. 更新观念,改变习惯思维方式,强化主体意识。观念和思维的改变首先在于自觉摆脱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封建残余思想和极端狭隘利己的思维角度,冲破自我设置的性别障碍的误区,既要抛掉一切都等国家出台新的法令政策保护的依靠思想,也要摒弃传统的依附男人、以家庭为核心的陈旧的角色观念。充分发挥女性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身的智慧潜力,以积极勇敢的态度争取女性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开拓进取的姿态挺立在知识、信息、人才展开激烈竞争的新世纪舞台上。只有女性群体自己起来自觉清除、抵制思想观念中的各种沉渣和污浊;只有女性群体对自身在新世纪的社会角色标出高的定位,女性才有可能在新千年争得社会生存、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的根本改革,才能真正与男性一样在同一跑道上加速前进。

2. 提高女性群体的品德素质和心理素质,作为持续不断的目标要求。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由此引导出社会道德观念和道德认知的多种变化。如何建立正确的道德认知系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想,是提高女性群体素质的第一大课题。正确的道德认知是建立在自尊、自爱基础上,以对非道德思想和行为的根本否定为前提的,一种对是非对错具有较高的评判能力和抵制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感的内核是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热爱、投入,即事业感。女性群体在新世纪变化万端的社会中只有具备较高的道德评判能力和抵制能力,树立高度的敬业思想和社会责任感,培植自立自强,勇于开创的事业心,才能以良好的道德素质保证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赋予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实质性的内涵。而提高女性的心理素质与良好的道德素质是相辅相成的。女性提高心理承受力和自我应变能力是适应社会发展,保护自我的必要心理条件。科学技术的重大飞跃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尤为明显的是引起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两种状况:一种是劳动人员更替频率加大,岗位转换频率加大,劳动者就业保证率降低;另一种是社会对职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低学历、低知识层次、无技能的劳动者淘汰率越来越高。女性群体素质的提高却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女性个体只能积极调整心态,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思路,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做好承接新的社会岗位角色的心理准备。同时抓紧平时对知识、技能的积累、学习、提高,这样才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高昂的斗志面对逆境和困难。

3. 学习终身化要成为女性群体的自身追求。教育按一般意义的理解是指学校教育,也是现代个体预期社会化的必经之途。由于中国地域广袤,经济、文化发展的层次性,加之历史的、主客观的各种因素,女性群体接受学校教育的状况不均衡。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各种类型学校集中,教育设施齐备,教育质量较高,男女接受教育上享受同等权力和机会;而在偏僻落后的边远山区,学校分散、数量少,教育设施因陋就简,师资匮乏,更由于封建意识的残存,女童失学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一切对于进入新世纪的女性整体素质的提高是严重阻

<sup>①</sup>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8年5月4日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讲话。

碍。对此,在“希望工程”之外,全国妇联又推出“春蕾计划”,要全面实施这一计划,不仅是妇女界须尽心竭力,也要全社会的热情支持和鼎力相助。教育是基础,女性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教育的巩固和发展。

在我国,学校教育之外的自我教育已成为一种必行的教育模式。纵观女性的各个阶层,即可明了,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层而言,职前教育,终身享用的传统模式已经落伍,就职后的继续学习、自我教育,即继续社会化的功能日益突出。女性知识分子要适应职业角色,工作中取得进步和创新,就必须以各种途径继续接受新信息、新知识、开阔视野,培植创造性思维,提高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否则同样会在社会激烈的竞争和飞速发展中被筛选掉;大多数文化程度低,从事简单、落后生产的女性群体,重返学校回炉提高已不可能,只有采用多种社会教育手段,进行弥补教育,如企业里的岗位培训、转岗培训等;社会上的下岗人员技能培训;农村中的农业科技培训、科学知识补习班等多种形式。在此基础上营造浓厚的社会学习氛围,促进女性个体学习的主动性,加强学习能力、学会学习、善于学习、继续学习,使学习成为每个女性个体持续终身的需求。

中国女性就像一座蕴含量丰富的金矿,如果这

片矿藏得到很好的挖掘、开发,使这部分智力资源得到充分使用和发挥,对于增加社会知识的积累贮量和应用能力,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效应将是难以估量的。反之,这部分智力资源得不到开发或废置,对整个社会就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辐射各个领域,成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目标的情力和障碍。

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的女性较之过去,开始了完全意义上的崛起,这首先在于主体意识的觉醒,参与意识、竞争意识的增强,女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感到维护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重要性;实现男女事实上平等的重要性;追求科学知识,完善自我的重要性。同时女性主体接受教育的层次和知识构成也有了突破性的跃进,女博士、女硕士的队伍每年以百进位、千进位的数字递增;在高等院校中,女大学生的人数与男大学生的人数已等量齐观,文科有的专业女生人数还多于男生。提高女性素质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主体的女性需要自身不懈努力。而一个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力的作用和适宜的外部条件的有机融合,女性群体才能更好地充实提高、开拓创新,在推动祖国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更新、完善群体和自我。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47页)数十年来以农业安置为主体的传统思路必须有所扭转,否则库区移民“有饭吃、有活干”的基本要求根本就无法实现,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库区调查结果。

除前述调查数据显示的问题之外,目前仍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库区移民人口增长、耕地减少、资源贫乏、环境恶化和生活水平较低的状况。例如,位于鲁中山地,属于济宁市的贺庄、龙湾套和华村三个中型水库库区的19647人,截至1997年,人均耕地仅0.49亩(0.033公顷),人均收入仅698.65元,人均口粮139.5千克,仅相当所在县人均收入的50%和人均口粮的40%左右。这些数据,不仅客观地反映了某些库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冲突的尖锐程度及其根源——库区众多移民被密集地安置在水库周边狭隘且贫瘠的区域所造成的土地严重超负荷运转。这种状况不改变,国家高投入而库区低产出的输血式运作方式将长期延续,它被生产资料的缺乏所左右,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这还客观地揭示了将库区超载的人力资源实行流域内非农化安置和转移,以缓解耕地严重不足,人地关系

尖锐矛盾的客观必然性和时间紧迫性。这是改善库区人地关系尖锐矛盾,满足库区广大后靠移民“有饭吃、有活干”基本要求的有效途径,舍此无他良图。烟台门楼水库区移民实行非农化安置和转移的实践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只是目前职工广泛下岗失业的困扰给实现库区移民非农化安置带来了思想上与实际上的严重障碍,但是适当地清退城市中来自库区农村的临时用工,并着眼于下岗职工不屑一顾的行业进行安置,库区移民在流域内实行一定规模的非农化安置还是有可能的。

总之,在以经济与技术手段帮助库区移民解决生产与生活问题的同时,加大库区移民向流域内受益地区非农化安置的力度和规模,缓解库区尖锐的人地关系矛盾无疑是从根本上加快解决库区移民生计困难的步伐,全面实现中央扶贫攻坚战略目标,使广大库区移民尽早与全社会共享富裕生活的根本途径;同时也符合中央拓宽移民安置门路的思路。只是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与考察工作,一如烟台市的作法。

(责任编辑 周皓)